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

主编 杨曾文 黄夏年

〔唐〕宗密 撰

邱高兴 校释

# 禅源诸诠集都序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

主编 杨曾文  
黄夏年

[唐]宗密 撰

邱高兴 校释

# 禅源诸诠集都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源诸诠集都序/(唐)宗密撰;邱高兴校释. - 郑州:中  
州古籍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5348 - 2767 - 9

I. 禅… II. ①宗…②邱… III. 禅宗 - 研究 IV.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786 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mm × 1168mm **大 32** **印张:**10.37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4 000 册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PDG



华严五祖圭峰宗密大师

 总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佛教和道教鼎足而立，是三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相互排斥的同时又相互吸收，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佛教本是从印度传来的外来宗教，然而它在中国这块辽阔丰饶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土上传播，经过漫长岁月，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密切结合，演变成中国的民族的主要的宗教。隋唐时期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基本结束，此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在这些佛教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在它们的蕴含深刻哲学思辨内容的教义理论中，有说色空、色心和体用相即的宇宙存在论，有论善恶、净染的心性论，有讲出世不离世间的修行解脱论，有用以沟通色空、色心和体用的“不二”的方法论……这些教义理论在中国历史文化，特别在哲学思想领域都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哲学思想都离不开对佛教的考察和研究。这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禅宗虽奉北魏时期来华的印度僧菩提达摩为初祖，但从历史真实情况考察，实际创立者应是被后世禅宗奉为四祖、五祖的道信（580～651）和弘忍（601～674）。在弘忍去世之后，他的门下形成以神秀（？～706）及其弟子普寂（651～739）

为代表的北宗，以慧能（638～713）及其弟子神会（684～758）、行思（？～740）、怀让（677～744）为代表的南宗。在“安史之乱”（755～763）后，北宗逐渐衰微以至湮灭无闻，而南宗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日益昌盛，并在唐末五代形成禅门五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进入宋代，临济宗又分成杨岐、黄龙二派。两宋是禅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它一跃而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主流派，在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和文化思想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此后，中国儒、释、道三教日益会通融合，佛教内部各宗也互相融通，禅宗与净土念佛信仰的结合最为密切，以至形成“念佛禅”。

禅宗虽标榜“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的文字著述最多，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以禅法语录最多。记录慧能的语录有《六祖坛经》，记录神会语录的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此后怀让、马祖、怀海、希运以及禅门五宗的创始人义玄、灵祐和慧寂、良价和本寂、文偃、文益，后世各宗著名禅师几乎都有语录行世。语录有别集，有合集。在语录集子中既有禅师在开堂、上堂、小参、普说等各种场合的说法记录，也有师徒间的答问，有对前人公案的评说——拈古，有评述这些公案的偈颂——颂古，有代前人回答质询的代语，有在前人答语之外另作答语的别语，还有书信、法语、序跋、碑铭、题赞、札记、遗表等。在语录中，有贴近当时民众的通俗白话，有含意清丽玄远的诗偈。在语录外，有卷帙浩繁的史传，包括以语录为主的灯史、以记事为主的传记、按编年记述的通史。此外，还有论议、杂著、清规等。这些数量庞大的禅宗文献，无疑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社会

科学界对宗教研究的深入展开，在对佛教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从事佛教研究的人员和社会上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不少经过校订注释的有价值的佛教参考资料。在大量佛教文献面前，为研究者和读者使用方便，还有必要按类别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分阶段地作校勘、标点和注释出版。

现在奉献在诸位面前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是一套中国禅宗系列的文献选编。其中收录了中国禅宗的部分重要史书、语录和清规等文献，皆请学者依据较好的版本作了校勘、分段和标点，并且一律改用现在通用的简化字体。虽然所收文献的数量不是很大，但在目前公开出版的禅宗著述较少的情况下，这一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给从事佛教禅宗研究和中国哲学、文史研究的学者和广大读者以不少方便。我们深知此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希望边工作边改进，谨望读者今后经常给我们提出建议，不吝赐教，以便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

杨曾文



## 序 言

本书是对宗密所撰《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第八修证门”和《圆觉经略疏钞》卷四“第八修证门”的校释。宗密是唐代著名的佛教宗师，既是禅宗荷泽系的第五代传人，又是华严宗的五祖。在上述四部著疏中，宗密对于唐代禅宗发展状况作了整体的概括，并对各派的禅法特色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既为我们了解唐代禅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又反映了宗密本人的禅宗史观。

### 一、圭峰宗密的生平

唐代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被冯友兰先生誉为“上为以前佛学，作一结算，下为以后道学，立一先声”的著名僧人宗密诞生在果州西充（今四川南充一带）的一个何姓的富裕家庭中。

宗密幼年时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髫专鲁诰”。髫，指小孩的头发，象征十岁左右的小孩子。鲁诰，就是儒家的经典。他还说：“言髫冠者，初习之间岁数，非的指十岁及二十岁也。实而言之，即七岁乃至十六七为儒学。”这就是说他从大约七岁左右开始专攻儒学，一直持续到十六七岁。在这期间，宗密不仅学习了《诗经》、《尚书》，而且

对《周易》、《老子》等都有涉猎。宗密的著作经常广征博引释家以外的经典，应当说和他这段时间所受的教育有密切关系。但令宗密感到苦恼的是，在儒家经典的学习中，始终没有发现能使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而是“每觉无归”。在十八岁左右，宗密开始对佛教的经典产生兴趣，听讲研习，稍有收获，“薄似有寄”。由此开始吃素，屡次邀请僧人到家中讲法、设置法筵招待僧人。但是宗密从佛教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精神力量，而是“俱溺筌罥，唯味糟粕”，诸多人生的疑惑仍然存在，佛教的信仰远非坚定。所以，在二十三岁时，他又放弃了对佛教的学习，重新专攻儒学。当时，遂州有一所著名阐释儒学的义学院<sup>①</sup>，宗密慕名前去，继续读经求学，打算考取功名。但是经过近两年的学习，宗密始终没能建立对儒学的兴趣和考取功名的热情。

正在他觉得彷徨无助的时候，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出现了，他就是道圆禅师。道圆禅师师从益州南印，益州南印师从磁州智如，磁州智如则是荷泽神会的弟子，因而道圆禅师是荷泽宗的后人。据宗密所记，道圆约在公元804年，到遂州传法，住在大云寺。一个偶然的机会，心中苦闷的宗密遇到了道圆禅师。相见之下，道圆的一段开导，使他茅塞顿开，“问法契心，如针芥相投也”，于是跟随道圆“落发披缁，服勤敬事”。此后五六年间的时间，宗密一直跟随道圆学习。在这期间，宗密所接触到的两部经典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sup>①</sup>严耕望在《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中认为，唐代士人中举以前在寺庙读书是常见现象，寺庙也常开设寺塾，教授俗家弟子，而僧侶自任教师，故宗密所就学的义学院可能与佛寺有关。详见《唐史研究论丛》第374页，新亚研究院，1969年版。

为他成为一代著名宗师奠定了基础。这两部经典一部是《圆觉经》，一部是《华严法界观门》。《圆觉经》是宗密到当地的府吏家做法事，依次授经时得到的。宗密初读即深有感触，以至于尚未读完，就痛哭流涕。宗密的很多重要著作都和《圆觉经》有关，和他这段时间对《圆觉经》的特殊感受是分不开的。《华严法界观门》是华严初祖杜顺的著作。宗密是在道圆禅师那里获得这本书的。宗密说：“遂屡咨参，方蒙授与终南大师《华严法界观门》，佛法宝藏，从此顿彰。”从此“同志四人，琢磨数载，一句中理论则通宵未休，一事中义旨则尘沙莫算”。这是宗密最早和华严思想结缘。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宗密跟随拯律师受了具足戒，成为一名正式僧人<sup>①</sup>。随后，他拜见了在益州（今成都）的师祖南印和尚。南印和尚对他这个徒孙十分欣赏，认定他是“传教人也，当盛于帝都”。此后，过了两三年左右，约在公元810年，宗密离开四川，北上求学。当他跋山涉水，游学到襄阳的恢觉寺时，遇到了华严宗澄观大师的弟子灵峰。此时灵峰重病在身，将不久于人世。相见三天，二人相谈十分默契。灵峰也觉得自己的所学有了传人，因此将自己身边所藏的澄观的《华严经疏》六十卷和《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九十卷悉数赠给了宗密。这大大开阔了他的佛学视野，使他产生了“渴逢甘露，贫遇摩尼”的感觉。在初步研读之后，就在当地第

<sup>①</sup>《定慧禅师碑》、《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法界宗五祖略记》皆言是年宗密遇随州道圆，并于当年受戒，与宗密自述不符。宗密遇道圆当在前三年。此年当是宗密受具足戒之年，此前宗密自述“身为沙弥”就为一证。

一次开讲华严教义。

元和六年（811），宗密到东都洛阳去礼拜祖师神会和尚的骨塔，住在永穆寺。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使宗密和澄观迅速有了师徒的名分。原来，在灵峰赠给他《华严经》的疏钞后，宗密对《华严经》立刻产生了兴趣，并在详细研读之后，开讲华严。宗密口才很好，加上他理解深刻，立刻有不少的听众。到了东都洛阳后，一批在襄阳就听过他讲经的信众以及当地的信众请他继续讲解《华严经》。在听众中，有一个叫做泰恭的小和尚，受宗密讲演的感动，为了表示对佛法的虔诚，自断一臂。此事发生后，马上有人报告了官府。当时负责调查这件事的郑馀庆是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对佛教素来反感，以前就曾上书弹劾过佛教。对于这个毁坏身体的自残事件，作为儒者的郑馀庆自然要严加盘查，要找出幕后指使者。宗密是讲经者，又是泰恭的师父，自然脱不了干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招来牢狱之灾。“留守郑馀庆相公申上中书，取裁缘文状中云是华严门下。虑宰相寻问疏主虚实，疏主既未委识，恐不招承，遂修状具述所领解。”在郑馀庆的盘查中，宗密情急之下，只好谎称自己是名震朝野、受皇帝尊崇的澄观的门下。但是又怕官方会派人到澄观那里查证，澄观不认识宗密，当然不会承认他是自己的徒弟，一旦事情被揭穿，会惹来更大的麻烦。因此宗密急忙派弟子玄珪、智辉，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拜见澄观。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接触华严思想的过程，对澄观所撰《华严大疏》的理解，以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希望澄观能承认他这个弟子。澄观在看过宗密来信后，十分欣赏，立刻回信称宗密为“法子”，对宗密的请求予以认可。但是另一方面，也告诫宗密要十分谨慎，不要让他的弟子再

出现类似的事件。宗密立刻回信表示感谢，并称他本来应该即刻到长安去当面称谢，但是因为弟子的断臂尚未痊愈，所以不敢贸然上路，并称在泰恭的伤势痊愈后，会立刻到长安尽弟子之礼。

大约在次年，宗密到了长安，开始跟随澄观学习。据宗密自述，最初的两年，他一直侍奉在澄观左右，“昼夜不离”。后来虽然因到各寺讲经，不能再如先前一样，但是至少每个月要去看望澄观两次，并听受教诲。如果有疑问时，则不限时间，随时咨询。此时宗密三十多岁，思想正在成熟的过程中，经过跟随澄观大约四年左右的学习，使他对于华严思想以及各种经典的掌握和理解，更加深入和系统。

元和十一年（816）的春天，宗密离开长安城，到了终南山的智炬寺。在这里他首先对已经接触十几年的《圆觉经》进行整理，写出了《圆觉经》分段的纲要（科文），随后又作了《纂要》两卷。此后，约有三年时间一直在智炬寺读经，自述云：“宗密比所遇释门中典籍，未有不探讨披览，且终南智炬寺，誓不下山，遍转藏经三年，愿毕方下山。”三年过后，宗密重回长安，住在兴福寺，在此他搜集《金刚经》的相关疏论，吸收其精华，撰成《金刚纂要疏》一卷、《疏钞》一卷。其后，他对唯识之学发生兴趣，在当年的冬天于兴福寺开始研究，直到次年春天移住保寿寺，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宗密撰成了两卷《唯识疏》。

长庆元年（821）正月，宗密又回到终南山，住草堂寺，摒绝外缘，专心修行和著述。此一阶段是宗密著书立说的一个高峰期，也是确立他成为当时有影响的一代宗师的重要时期。他通过一系列著作的著疏，阐述了自己的佛学思想，展示了自己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首先，在这期间，他参考各家对

《圆觉经》的注疏，对自己撰于元和十一年（816）的《圆觉经科文》及《纂要》两卷，进行整理，到长庆三年（823）秋冬之际，撰成《圆觉经大疏》。宗密自述说，此经的注疏经过自己的反复思考、详细核查，并和同学、弟子作过多次讨论的基础上，不断修改，直到自认没有“疑滞之处”后，才最终完成的。自宗密初入佛门开始，《圆觉经》就是一部吸引他的经典。其后虽然接触华严思想，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圆觉经》的兴趣，澄观所著的《华严大疏》等著作更成为他解释《圆觉经》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此外这部经典的写作，宗密还参考了“《起信》、《唯识》、《宝性》、《佛性》、《中观》、《智度》、《瑜伽》、《摄大乘》”等诸多的论著。从宗密酝酿和准备《圆觉经大疏》的写作过程和其对宗密思想的影响程度看，无疑这是宗密最为重要的注疏。此后几年他又相继写作了《华严纶贯》、《圆觉经大疏钞》、《圆觉经略疏》、《四分律疏》等著作。

随着宗密的声名远播，太和二年（828），唐文宗在自己的生日，即十月十日的庆成节<sup>①</sup>那天，诏他入宫讲经，并赐紫方袍，赠“大德”称号。从武则天开始，赐紫色方袍就成为了帝王褒奖出色僧人的一种手段。因此，获得紫衣称号就表明

<sup>①</sup>吉川忠夫在《裴休传》中认为，“庆成节”设置始于太和七年（833），因此裴休所撰《圭峰禅师碑》中说“太和二年庆成节，征入内殿，问法要，赐紫方袍，为大德”。不能成立，太和二年（828）时尚未有“庆成节”的名称。因此有可能是太和七年的误写。（参见日本《东方学报》第64期，第133~134页）但如参考宗密在《都序》中提到的“住城”时间看，不可能是太和七年。因此应是裴休将后来才出现的名称冠于以前的事件上。

了一个僧人在政治上被认可，并有了获得士大夫和官僚阶层追捧的资本。宗密所获得这种政治荣誉很快使得他结交了更多的当朝的名士和官僚，如萧俛、温造、白居易、刘禹锡、裴休等。萧俛，唐文宗时任检校左仆射、太子少师。温造时任检校右散骑常侍、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白居易时任刑部侍郎。刘禹锡则先后任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裴休当时任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撰修、中书舍人等职。这些当朝的士大夫与宗密的交往大致都开始于他被征诏入宫讲法之后。萧俛、温造和裴休等都曾经向宗密问法，他们的问和宗密的答形成了宗密的另一个重要的著作《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又称《裴休拾遗问》）。白居易曾作《赠草堂宗密上人》，诗中写道：

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  
口藏宣传十二步，心台照耀千百灯。  
尽离文字非中道，常住空虚是小乘。  
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是重高僧。

刘禹锡也写过《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谒河南尹白侍郎》的诗，赠送给宗密：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  
东泛沧海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  
河南白尹大檀越，号把真经相对翻。

这两首诗，说明了宗密和刘禹锡、白居易都有很深的交情。

宗密在长安结识的诸多士大夫中，和他友谊最深，属亦师亦友关系者当为裴休。《法界宗五祖略传》中说：“朝臣士庶，

咸皆归仰，唯相国裴休，深入堂奥而为外护。”《宋高僧传》则说：“影待形起，响随声来，有宗密公，公则有裴相国，非相国曷能知密公？相续如环，未尝告尽，其二公之道如然。”裴休在唐文宗时官至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撰修、中书舍人等职。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开始出任外职，历任江西、湖南等地的观察使。因此二人的建立友谊应当是在裴休在长安任职时。在这期间，裴休曾经就禅法宗派的“浅深、顿渐、得失”等问题向宗密谘问，宗密作答。其后又为宗密的重要著作如《禅源诸诠集都序》、《圆觉经大疏》、《原人论》、《注华严法界观门》等撰写序言，推动了宗密著作的流通。在宗密去世以后的大中六年（852），裴休官居宰相，成为朝廷重臣。大中七年（853），唐宣宗追谥宗密“定慧禅师”之号，并赐塔额，裴休亲撰《圭峰禅师碑铭并序》，高度评价了宗密的宗教修为，也成为后世了解宗密生平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宗密在官场中广交朋友也险些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他被牵连到了著名的“甘露之变”的事件中。在唐太和九年（835），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李训在唐文宗李昂的支持下，密谋诛杀专权的当朝宦官。他们诈称左金吾厅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前去观看，准备埋下伏兵，一网打尽。但不料伏兵被宦官发现，事情败露，李训只好慌忙逃到了终南山，投奔宗密。宗密因为和李训交往很多，关系不错，于是打算把他剃发后藏在寺院。但因为弟子们意识到风险太大，阻止了宗密。虽然宗密最终没有收留李训，但是仇士良还是以容留朝廷重犯的名义，派人将他逮捕入狱。随后控告他犯有“不告”之罪，准备处死。宗密本人对此倒是不以为然，他说：“贫道识训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

心。”后来中尉鱼弘志十分钦佩他这种气概，为他求情，才免去了杀身之祸。

宗密的晚年时期，相继完成了《禅源诸诠集》（或称《禅藏》）及《禅源诸诠集都序》、《圆觉经道场修证议》、《盂兰盆经疏》等著作。特别是《禅源诸诠集》更是一部篇幅庞大的著作<sup>①</sup>，乃宗密晚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①宗密是否完成此书，有不同看法。镰田茂雄认为宗密虽有打算，但并没有写。但是冉云华则认为宗密不仅作了《禅藏》，而且有一百卷之多。而且据他所言，镰田茂雄后也接受了他的观点。（参见冉云华的论文《宗密著〈道俗酬答文集〉的研究》，《华岗佛学报》第4期）杨曾文认为宗密作了此书，但是数量远没有百卷之多，估计只有二三十卷。（参见《唐五代禅宗史》第408~4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日本学者黑田亮最早于《朝鲜旧书考》（岩波书店，昭和十五年）中提出，《禅门宝藏录》（现收于新纂《续藏经》64）中录有部分宗密所撰的文字，标为出自“圭峰《禅源诸诠集序》及《本录》”，其中部分文字和现存《禅源诸诠集都序》基本相同，但另外一部分文字不载于《都序》，当出自《本录》，由此，黑田亮提出了《本录》是否就是《禅源诸诠集》的问题？如果是，那么《禅源诸诠集》在宋末元初时尚存世。镰田茂雄经过进一步对比发现，不载于《都序》的文字，可以在《圆觉经略疏钞》的卷四、卷五找到对应的文字。（参见镰田茂雄《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39~240页）西口芳男在《〈禅门宝藏录〉の基础的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因为《诸诠集》是诸家文字语录的集录，《宝藏录》中被认为属于《圆觉经略疏钞》卷四的内容涉及达摩和慧可的对话，也可以看成是属于《诸诠集》，但是对应于《略疏钞》卷五的内容则完全是宗密所言，因此他断定，所谓《宝藏录》中出于《本录》的文字实际上是引自《略疏钞》，而非《诸诠集》。（参见《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第2期，第729页，2000年3月）

唐会昌元年（841）正月初六，宗密卒于兴福塔院<sup>①</sup>，享年六十二岁。遗体后移至圭峰，并于此火化。

## 二、《禅源诸诠集都序》及其禅教会通思想

### 1. 《禅源诸诠集都序》撰写年代与版本

《禅源诸诠集都序》（以下简称《都序》）是宗密为一部其编纂的长达百卷的《禅源诸诠集》（或称《禅那理行诸诠集》，又称《禅藏》）所作的序言。因为《禅源诸诠集》本文已散佚，所以《都序》就成为了解宗密那本规模宏大的论集的一个重要著作。

宗密撰写《禅源诸诠集都序》和编纂《禅源诸诠集》的具体时间，在有关宗密的传记中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是在《都序》中，宗密提到的一些事件隐约地透漏了本文撰写的一个大概时间段，他说：

虽佛说悲增是行，而自虑爱见难防，遂舍众入山，习定均慧，前后息虑，相计十年。云前后者，中间被敕追入内，住城三年（两年），方却表请归山也。

宗密“舍众入山”，指从长安退居在终南山。《大疏钞》中宗密自述：“后自觉化缘劳虑，至长庆元年正月又退在南山草堂寺，绝迹息缘，养神炼智。”这就是说宗密从长庆元年（821）开始住终南山，先后共计十年时间。除去中间太和二

<sup>①</sup>宗密去世时所住寺院，裴休碑中说在“兴福塔院”。此兴福塔院位于何处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认为兴福塔院位于宗密常住的草堂寺，一说认为兴福塔院即宗密曾经住过的兴福寺。